

晚清海关洋员与国际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

——以 1884 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为例

宫宏宇

摘要: 1884 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期间, 中国展厅内展有四十多种中国乐器。赴会的六名中国乐人除了每天定时在展区内的中国茶室和餐厅奏乐外, 还应邀为英国皇亲国戚的社交活动助兴。是谁决定将中国音乐作为博览会的主题之一? 是谁将中国民间乐人推向了国际舞台? 这些乐人演奏了什么乐曲? 伦敦报界又是如何报道中国乐人的表演呢? 本文拟通过对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中晚清参加世博会之展品目录、晚清海关洋员间的相关函电以及伦敦当时的新闻报道的解读, 来回答这些问题, 旨在通过中西原始文献之比较来补充前人研究所未见, 并试图厘清目前研究中的相关疑点。

关键词: 博览会; 八角鼓乐人; 赫德; 金登干; 阿里嗣 《华祝歌》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71 (2015) 02-0003-17

DOI:10.16504/j.cnki.cn11-1183/j.2015.02.001

引言

1884 年 7 月 9 日是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 (也译成“伦敦养生会”或“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中国展区开幕的日子。是日, 在“长 150 英尺、宽 50 英尺”的中国馆内^①, 琳琅满目地陈设着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的古玩、字画以及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的各种生活用品。引人注目的是, 在展厅靠近接待室的显要位置, 除了从清驻英使臣曾纪泽处借来的中国典籍、画轴、笔记小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译作、中国民间工艺品外, 还有第 40、第 41 展区中展出的四十多种中国古今乐器。^②在同年 8 月专为展览会编辑出版的《1884 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中, 还有近四十页的关于以上每种乐器的制材、形制及功用的简介, 中国音乐体系的概说, 十六首翻译成五线谱的中国歌曲、乐曲谱例和八幅精心绘制的乐器图示。^③

更有意思的是, 来参观的人群并非只限于静静地观赏这些中国展品或细读展品下面的解说词,

收稿日期: 2015-03-02

作者简介: 宫宏宇 (1963~), 男, 博士, 新西兰国立尤坦理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骨干专家。

① 金登干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84 年 4 月 1 日致赫德 (Robert Hart) 函, 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1874—1907)》(以下简称《密档》) 卷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1995 年, 第 513 页。

② “The Chinese Court at the Healtheries”,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8, 1884, p. 6.

③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 London: William Clowes, 1884, pp. 143-180.

他们还可以聆听到其中一些乐器所发出的实际音响。因为在中国展厅内还有一个由来自北京的六个乐人组成的小乐队在现场演奏。在之后的几个月里,这六位中国乐师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和下午四点到六点都分别在中国展览馆内的由曾纪泽亲笔题字的茶室“幔亭”和餐厅“紫气轩”配乐,有时他们还会在展室外的中式凉亭和花园水池上的小桥上为参观者表演乐曲。此桥是由两名“技艺精湛”的中国工匠特地为1883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渔业博览会所搭建的。“中国乐队在桥上的演奏,受到了热烈的喝彩。”^④除在中国展馆内外的固定演出外,这些中国乐师还被英国皇室成员邀请为其社交活动增色,如7月25日他们就应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之邀,“在马尔巴勒宫举办的游园会上演奏”。^⑤他们在“建在展馆区外的剧院”的表演,也“演出得非常好”。^⑥

是谁决定将中国音乐作为此次中国参加伦敦博览会的主题之一?是谁将中国民间乐人推向了国际博览会的舞台?这些中国乐人来自何方?他们演奏的是什么曲目?中国成功参展的幕后又有哪些出力者?他们在此次博览会上献艺的过程中经历过哪些波折呢?伦敦报界又是如何报道中国乐人的表演的呢?本文通过三种途径来回答这些问题:1. 检索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中晚清参加世博会之展品目录;2. 解读晚清筹办博览会海关洋员间相关之函电;3. 参阅伦敦报界对中国乐人之相关报道。本文宗旨有二:1. 通过中西原始文献之比较来补充前人研究所未见;2. 厘清目前研究中的相关疑点。

一 赫德、伦敦世界卫生博览会、中国音乐

谈到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可以不谈晚清中国海关,谈晚清中国海关就必须谈及在中国服务半个多世纪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籍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见图1)。从1867年总理衙门委托赫德接手中国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承办事宜,到1905年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后相关事务转交商部专办为止,由海关承办的中国参加的各类国际博览会至少有近三十次。^⑦虽然从1851年中国人首次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上露面开始,就有音乐表演助兴^⑧,但从展示中国音乐的角度来看,中国参加1884年7月到10月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卫生博览会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次。与以往几次一样,中国参加此次博览会的大小事宜,从始到终都是由赫德亲自操办的。^⑨中国乐人在博览会上的表演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国内外学界以往有关赫德的研究,多注重赫氏在西乐东渐上所做的工作。特别是赫德的由北京理发匠、鞋匠、裁缝和车夫组成的管弦乐队,以及该乐队夏日每周三在其宅邸举办的花园派对。如美籍华裔学者韩国铎先生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对赫德在北京成立的管弦乐队以及赫氏与《中国

④ 金登干1884年7月11日致赫德函,见《密档》卷三,第578页。

⑤ 金登干1884年7月26日致赫德电,见《密档》卷八,第3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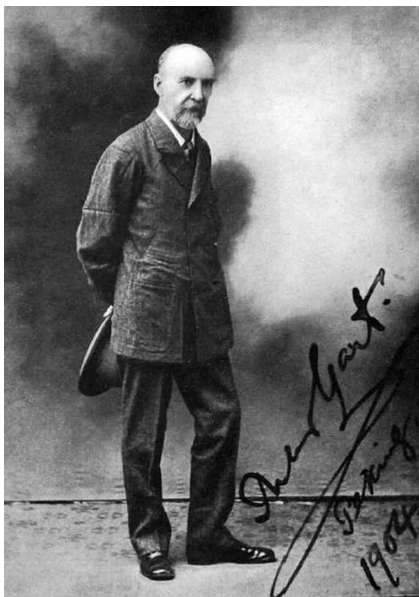
⑥ 金登干1884年7月25日致赫德函,见《密档》卷三,第583页。

⑦ 关于由晚清海关洋员承办的代表清政府参加世博会的次数,中外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曾任海关税务司多年的英籍人斯坦利·魏尔特(Stanley Fowler Wright, 1873—1951)在其《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m. Mulan and Son, 1950])一书中(陆琢成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上册,第10页)说共参加28次;吴松弟在其《走向世界:中国参加早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一文中(载《史林》2009年第2期,第43、46页)则称只11次。

⑧ 罗士龙《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戏剧舞台上的中国艺人》,《戏剧研究》,2012年第10期,第5页。

⑨ 赫德1884年1月14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448—449页。关于赫德领导的清海关总税务司署与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的关系,可参见吴松弟《走向世界:中国参加早期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载《史林》2009年第2期,第42—48页;詹庆华《跨文化传播的桥梁:中国近代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交流》,载《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30页。

图 1.



图示来源: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iège Universal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905.

音乐》一书的作者阿里嗣的关系有过深入的探讨。^⑩ 韩先生虽然在《赫德乐队研究》和《阿里嗣小传》两文中分别提到过赫德派阿里嗣参加伦敦卫生博览会做音乐介绍主讲人和派中国演戏人员献艺之事，但他根据的是1975年出版的《总税务司在北京》一书中所刊载的赫德有关伦敦卫生博览会的信件^⑪，但对具体经办人金登干的回信却没有涉及。对伦敦卫生博览会举办时所出的，包括中国乐器、中国乐谱及中国音乐简介的《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也没有利用到。后来的学者虽然也提及赫德与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的关系，但引用的都是韩先生的研究，都没有接触过包括《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在内的其他相关原始资料。^⑫

1884年的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虽然是以健康（health）为主题，以展示各国食品供应水平为目的，但对音乐情有独钟的赫德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他把中国宗教和日常生活中的乐器与音乐活动与医学、教育一样，作为此次博览会一个重要的展览项目。除实物展示乐器外，他还希望通过学术讲座和现场表演的形式让西方人了解包括音乐活动在内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早在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还在犹豫接受组委会的邀请时，赫德就在1884年元月14日寄给其在伦敦的代理人金

^⑩ 韩国嬭《赫德乐队研究》《阿里嗣小传》，《韩国嬭音乐文集》第一卷，台北：乐韵出版社，1990年，第5—26、155—160页。

^⑪ John King Fairbank, Katherine Frost Bruner,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eds.,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 vols.

^⑫ 如陶亚兵在《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7页）的相关叙述。李云的《赫德与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史实初探》一文（载《海交史研究》2007年1期）虽有“赫德与国际希尔兹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一节（第95—99页），但基于的史实都是韩国嬭文章中出现过的。该节涉及阿里嗣的部分也只是沿袭前人的成果，重述了阿里嗣同年所刊行的专著《中国音乐》，并没有证据显示她接触过此次博览会的原始资料，特别是《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展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中的“中国音乐”专章。

登干的一封关于筹备博览会事宜的长信中提到他的打算和有关音乐活动的初步安排:

也许我们还要给你送去一篇论中国教育的好文章或演讲稿(由贺璧理提供),另一篇是论中国音乐的(由阿理嗣提供)。你须宣读论教育的那篇,阿里嗣可能作为秘书之一前去宣读他的那篇文章。尤其是假如我能动员一个中国的丝竹乐队前去就更好了(在餐馆演奏音乐,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乐事来“折磨”伦敦人的听觉)。^⑬

虽然到 1 月末总理衙门还没有给他明确的指示,但赫德代表中国参加伦敦卫生博览会参展的决心已定。在 1 月 27 日给金登干的私信中他甚至写道“如果不是以官方的名义参加,则以我私人展出者的名义来搞。”^⑭ 2 月初,当清政府终于决定参加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并像以往一样授权他做具体的安排时^⑮,赫德不仅已将赴会的中国乐队人选搞定,还对他们的行程做了安排。在 3 月 8 日的信中,他告诉金登干,前去参加卫生博览会将会有中国人“约三十人”,其中包括了来自北京的“乐师”六名,他们将于 6 月 4 日抵达伦敦。^⑯

在赫德的安排下,最终赴伦敦的中国参展团由商人、乐师、厨师、账房、剃头匠、侍者、木匠、油漆工等一行共 31 人组成^⑰,分别于 1884 年 3 月 29 日和 4 月 10 日坐二等舱从中国乘轮船经孟买赴伦敦。这些团员往返的旅费、工资和其他开支等全部由海关承担。赫德对如何安排他们的吃住对金登干做了具体的指示:

你须在博览会附近给他们找地方住。要知道,你可让这些中国佬住得很挤,他们不需要宫殿似的套间。应把他们安排在一起或彼此很近,最简陋的住处也比他们在中国的房子好些。我们须管他们的吃住:大米、蔬菜、咸鱼和猪肉就足够了。可以这么说,他们多少都是些苦力。^⑱

赫德明示金登干按照劳工的身份对待赴会的中国人,规格不要太高。这虽不乏种族歧视的味道,但更多是出自实际的考虑。提倡节俭办事一向是赫德参加世博会的作风。因为海关代表“中国政府”参与世博会只有部分经费由总理衙门拨付,大部分花费都来自海关的预算。在 5 月 17 日给金登干的信中,赫德一再提醒金氏要节省,并抱怨说“我只担心你的费用(切记总理衙门并没有给我提供一笔现款,衙门只是叫我去做,如我不做,就要挨罚,如我做了而花钱太多,那可能要叫我掏腰包!)”。^⑲对海关洋员的住宿开支,他也是能省就省。^⑳

但是,赫德对中国乐人和其他参展人员也有他慷慨的一面。如他虽然明知往返的船费昂贵,“要花一万两”,但仍安排中国工匠“全都坐二等舱”。^㉑为了让这批中国工匠对伦敦民众的娱乐活动有好的体验,他还要金登干为这些中国人在伦敦期间安排一些娱乐活动,如观光、听音乐会等。他特别嘱咐金登干说“请你给那几个参加卫生博览会的中国人安排一下游览名胜、听听音乐等活

⑬ 赫德 1884 年 1 月 14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52 页。

⑭ 赫德 1884 年 1 月 27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61 页。

⑮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 Official Catalogue*, London: William Clowes, 1884, p. 158.

⑯ 赫德 1884 年 3 月 8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85—486 页。

⑰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 p. 142.

⑱ 赫德 1884 年 3 月 8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86 页。

⑲ 赫德 1884 年 5 月 17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45 页。

⑳ 詹庆华《晚清海关洋员与世界博览会》,《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80—81 页。

㉑ 赫德 1884 年 3 月 31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05 页。

动，我很愿意这批北京人对我们伦敦的公众娱乐带回好的看法，并有很多材料可讲给别人听”。^② 他付给这些中国工匠的报酬（十个月的工资，共一百五十两，其中一百两已于出发前在北京预领）也算得上公平。^③

关于怎样遴选、调遣和使用这些中国乐人，赫德也早有具体的想法。在 1884 年 2 月 17 日的信中，他明确告诉金登干：“我将和餐馆人员一起派出我们北京的六名伶人，他们会表演、能弹善唱，我将在以后的信里告诉你希望怎样使用他们。他们应受严格的控制，未经你的允许不得为任何人做任何事”。^④ 在 4 月 27 日的信中，赫德再一次提到“关于厨师、乐师的事我明天将正式写封信给你”。^⑤

赫德在信中虽然提到这些乐人来自北京，能“表演”也善吹拉弹唱，但他没有提到这些乐人演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幸运的是，博览会期间伦敦媒体的报道（见图 2），以及时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当时的日记，让我们对这六位中国乐人的音乐背景及其所擅长的曲目有了大致的了解。可以肯定，他们是来自北京的八角鼓班艺人。八角鼓是源自满族地区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原为满族人散居时期的歌曲，到清乾隆年间才发展为坐唱形式，并有专业艺人出现。在北方各地，特别是北京、天津和东北各地曾广为流行。八角鼓最初的演出形式是由一人手持八角鼓自弹自唱，后来发展为有单唱、拆唱、群唱等形式。八角鼓的唱腔格式也多种多样，由四句板、数板、若干曲牌和煞尾构成。^⑥ 从以下的图示（见图 2、图 3）可以看出，此次被赫德派去参加博览会的北京八角鼓乐人所持的乐器有三弦、拍板、大鼓、板鼓等，演出的形式显然是以说唱为主。

图 2.



图示来源: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August 2, 1884.

^② 赫德 1884 年 4 月 20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23 页。

^③ 金登干 1884 年 9 月 12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609 页。

^④ 赫德 1884 年 2 月 17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72—473 页。

^⑤ 赫德 1884 年 4 月 27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30 页。

^⑥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年，第 7 页。

图 3.



A SCENE FROM A CHINESE PLAY.

图示来源: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10, 1884, p. 6.

这些八角鼓艺人不仅在会场上定时演出,还在自己住的地方为好奇的游人单独展示。^{②7}在北京居住过的曾纪泽也似乎非常喜欢听这些艺人的演奏。他们在伦敦的几个月中,屡次赴曾府献艺,曾纪泽在日记中至少有七次提到过听“中国八角鼓班乐工奏乐”,有时还“复听良久”。

曾纪泽虽然对八角鼓艺人的演艺展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对赫德选派这样社会地位低微的曲艺乐人代表中国参会却颇有微言,对他们在博览会上表演的曲目也并不认同。在 10 月 3 日写给赫德的信中,金登干汇报说“曾侯说这些人选得不好,其中只有两个人够得上称乐师。他说中国有一种一个音阶为十二个音符的古典音乐,但是这些乐师演奏的曲调不是纯汉族的,而是从蒙古和别处传入的。”^{②8}

关于中国乐师在博览会上演奏什么乐曲,赫德有具体的指示,并为此与金登干有过不同的意见。他所要展现的是能体现中国人生活特色的音乐文化。当得知中国乐师在卫生博览会上演奏的曲目中包括英国国歌和英国流行歌曲时,他颇为不满,当即给金登干发电报明令指示“中国乐师仅限演奏中国乐曲。”^{②9}对此,一向对赫德俯首帖耳的金登干颇有些不解,他解释说,一开始他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他觉得中国的乐师“应能演奏《上帝保佑我女王》《上帝祝福威尔士亲王》《统治吧英国》和几首我们英国的歌曲”,并认为“这是不可少的”。他还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和其他的例子力争道:

事实上,如果成功是根据群众的喝彩来判断的话,他们主要的成就应归于他们演奏了这些曲子。来到博览会或来英国的外国乐队,都力图用演奏这些我国的歌曲来获得人们的同情,在这方面中国乐师们的确获得莫大的荣誉。^{③0}

尽管金登干做了解释并据理力争,但赫德仍不为所动,他坚持己见并解释说:

^{②7} “Chinese Music at the Exhibition”,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10, 1884, p. 6.

^{②8} 金登干 1884 年 10 月 3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627 页。

^{②9} 赫德 1884 年 8 月 12 日致金登干电,《中国海关密档》卷八,第 335 页。

^{③0} 金登干 1884 年 8 月 1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86—587 页。

我不同意你让这些乐师演奏英国曲子，我怕他们只会被人嘲笑！他们演奏自己的音乐，可以让中国人听着很顺耳，虽然英国人觉得里面可能没什么内容，但我们希望他们演出的正是那个没什么内容。^{③①}

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首次代表清政府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时，赫德曾让中国参展团在博览会将近结束时在维也纳歌剧院举办盛大的答谢音乐招待会，款待包括皇室成员及当地名流贵胄在内的一千四百多位来宾。“维也纳歌剧院所有的明星也都登台献艺，当地报界称这是当年最精彩的一场演出”。^{③②}此次参加在自己国家举办的伦敦卫生博览会，赫德打算再组织一次这样的招待会。但这次的招待会在时间和演出内容上要有所变化，招待会要在开幕时而不是在闭幕时举办，在节目的选择上也力求多样，不仅只是演唱演奏西方音乐，而是兼容中西音乐的“联合演出”。在1884年2月17日的信中，他提示金登干说：

你还记得那场作为结束我们在维也纳展出的盛大的音乐招待会吗？好吧，我希望你以多少类似的方式来开始我们今年在伦敦的展出。在6月初或月中以前我们的东西不能运动，我们的展区也没有准备好。你能找到一个地方——一座大厅或歌剧院——在10号和25号之间用一个晚上吗？你能安排一场联合演出吗？——有第一流的军乐队和第一流的弦乐队演奏乐曲、几位最有名的歌星的唱歌、某个名演员的朗诵，我们的中国乐队演奏一首中国曲子、几支歌和一些乐曲（这将是他们公开的首场演出）。我想举行这样一个盛大招待会，我们可以打响第一炮，并且以这样一个榜样来协助把这季节搞得很出色。要向经严格挑选出来的那些人中的最精选的人士发出邀请——王族、政界、名流、文献艺术界等人士。你对这个主意仔细想想，并和内子商量一下。但在你觉得是否这么做以及做什么之前，不要向别人讲。在决定之后，千万小心要把管理、安排和发请柬的事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不许任何外人（如嘉理治和奥地利外交部）插手并“指挥”你。我想花1000镑可把这么个招待会办得不错，不等到闭幕而一开幕就立即出名。^{③③}

在3月8日的信中，他又一次问金登干：“你在6月可以举行那场招待会吗？”虽然他对举办招待会的想法仍有信心，但此次他也开始考虑费用的问题。“除非你确有把握搞成功，否则不要试着去办。当然我得‘支付’花在这上面的1000镑，因此，除非是值得做，并且可以做得很好，我还不如省下这笔钱。不过这些博览会使我从腰包里拿出那么多钱，以致今年我得豁出去了”。^{③④}可惜的是，意外出现的情况（中法冲突、皇室成员的丧事）使得赫德举办音乐招待会的计划最终无法实施。^{③⑤}

二 金登干夫妇、中国乐人、英国乐曲

赫德虽是中国参加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并在展会上展示中国音乐的决策人和展项的主要策划者，但此次赫德本人并没有赴英，具体实施的是他的亲信、自1874年即被选为中国海关驻伦敦

^{③①} 赫德1884年9月14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610—611页。

^{③②}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537页。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③③} 赫德1884年2月17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472—473页。

^{③④} 赫德1884年3月8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489页。

^{③⑤} 金登干1884年5月1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34页。

办事处主任的英籍苏格兰人金登干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③⑥} 金登干除了与伦敦卫生博览会主办方和清驻英使臣曾纪泽协调、为中国展品构建场所、随时向赫德汇报外,他还负责管理赴会的31名中国工作人员在伦敦的衣食住行^{③⑦},有时甚至还得“教练乐师”。^{③⑧} 金登干对赫德派中国乐队一事从一开始就很赞成,并预言“在不止一个意义上丝竹乐队将成为轰动一时的事。”^{③⑨}

按照赫德的指令,金登干在中国团员刚到伦敦不久就安排他们去伦敦最著名的音乐厅去听音乐会。在6月6日给赫德汇报工作的信中,他提到“店主和乐师今晚和明晚有艾伯特纪念堂听朱利叶斯·本尼迪克特爵士的音乐会的票”。他还计划“安排他们到伦敦一些名胜和游乐场去观光”。^{④⑩} 这里提到的“艾伯特纪念堂”(Royal Albert Hall)是伦敦著名的音乐厅,可容纳听众五千两百多人,是世界著名音乐家在伦敦演出的首选场地。金氏信中提到的“朱利叶斯·本尼迪克特爵士”(Julius Benedict, 1804—1885)是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英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歌剧指挥家。他曾先后师从韦伯和约翰·胡梅尔(Johann Nepomuk Hummel, 1778—1837)学习作曲。19岁离开德国后,他曾在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等地的大歌剧院就职。1835年定居英国伦敦后,他先后在著名的剧院和交响乐队,如莱森剧院、德鲁里街剧院、女王陛下剧院和利物浦爱乐乐团任指挥。除担任歌剧指挥外,本尼迪克还以作曲闻名于世。^{④⑪} 值得一提的是,本尼迪克和曾纪泽也曾有过交往,在音乐上也合作过。1887年经由清驻英、法、比、意四国大臣刘瑞芬(1827—1892)之手交给英国外交部“以备兵勇谱奏之用”、“可合泰西乐器之用”的曾纪泽的《普天乐》谱,就是由本尼迪克配曲的。^{④⑫}

为了中国乐人在展览会上有成功的表现,金登干在对中国乐师演奏曲目的安排上也下了一番功夫。他特意安排他们学习演奏英国歌曲,以使他们的表演能引起当地英国观众的共鸣。他先是建议阿里嗣教他们学着演奏《上帝保佑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现译为《神佑我王》)、《上帝祝福威尔士亲王》(God Bless the Prince of Wales)、《统治吧英国》(Rule Britannia)和几首英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当阿里嗣认为“这件事如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时,他也没有放弃,而是告诉阿氏“在说那是不可能之前,需尽量努力去教他们。”后来考虑到阿里嗣与中国乐人的恶劣关系(详见下节),金登干把乐师们带到自己家里,“让每个人单独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女王》数次”,由他的夫人在钢琴上弹曲调亲自教授。^{④⑬} 值得一提的是,金登干的夫人是个相当不错的钢琴演

③⑥ 以往学界论及金登干时,或是讨论他在为清廷购买船舰中扮演的角色,或是评论其在中国内政外交(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功过,但对其在代表中国参加世博会方面所做的工作较少瞩目。韩国熿先生提到他多次为赫德采买乐器、乐谱一事。关于金登干之生平、在清海关的履历及与赫德的关系,其子 Robert Ronald Campbell 为其父所写的传记 *James Duncan Campbell: A Memoir by His 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 Monographs, 1970) 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中文研究成果可见张寄谦《金登干 (James Duncan Campbell) 与中国海关》,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46—56页;夏良才《海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论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8—40页。关于金登干与世博会,参见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第33—63页;程秀玲《金登干与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第31—35页。

③⑦ 金登干1884年6月6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57—558页。

③⑧ 金登干1884年7月25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83页。

③⑨ 金登干1884年3月21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495页。

④⑩ 金登干1884年6月6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68页。

④⑪ 参见《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另参见廖辅叔《与音乐有缘的外交官——曾纪泽》,收入廖崇向编《乐苑谈往——廖辅叔文集》,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④⑫ 关于本尼迪克为《普天乐》配曲及该曲在海外的出版和流传,笔者已有专述,见宫宏宇《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曾纪泽〈华祝歌〉〈普天乐〉考辨》,载《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1期,第101—104页。

④⑬ 金登干1884年6月20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68页。

奏家，据金登干自己讲，她曾经“由于钢琴演奏得到了伦敦音乐学院的银质奖章，在八十名比赛者中，她名列第二”。^{④④}

除金夫人外，金登干还请他认识的伦敦音乐家给这些中国乐人上音乐课，辅导他们排练并选择适合西方听众的乐曲。在6月27日写给赫德的信中，金登干提到：

明天我将开始让他们跟怀尔德博士的一名天才门生学一门音乐课，这人将教他们几首我国的歌曲，听他们演奏他们自己的乐曲，选出那些最适合西方人听的曲子，确定每支曲子的时间，并对演奏的节目提出一般性的建议。^{④⑤}

金登干在此之前向赫德汇报工作的信中也提到：

当他们演奏时，我们的提琴教师进来了，他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不过还是钢琴真正到达了预期的目的。内人说她可以使他们学会任何曲子。阿理嗣感到很惊奇。他们还试奏了《上帝祝福威尔士亲王》《快乐的家庭》和《再见吧老友》。几天之内我们将举行一次非正式的排练，我希望怀尔德博士的身体状况见好，那时他能出席予以最后的润色。对他们的这种关怀和鼓励，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今晨阿里嗣告诉我，他们对多数曲子已熟悉了。^{④⑥}

最后，为了让中国乐人能在无人辅导的情况下练习英国歌曲，金登干还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给他们买了一只演奏所有这些歌曲的廉价的美国百音盒”。^{④⑦}令他非常欣慰的是，7月9日博览会中国展馆开幕时，“中国乐队在桥上演奏，获得热烈的喝彩”。^{④⑧}在给赫德的信中，金登干是这样描述他们的表演的：

他们的演出以一首中国歌曲开始，以《上帝保佑我女王》结束。奏完《上帝保佑我女王》后要是“再来一个”的喝彩，他们就演奏《上帝祝福威尔士亲王》。为了答谢进一步的欢呼鼓掌，他们演奏《统治吧英国》，最后以《上帝保佑我女王》结束演出。他们还能演奏《再见吧老友》，获得相当好的效果。^{④⑨}

北京八角鼓乐师们在中国展馆内外的餐厅、茶室、小桥、剧院的演出，也赢得了相当的赞誉。特别是他们演奏的英国旋律，更是让英国观众感动，威尔士亲王在参观完中国馆后，还亲自对“乐师们演奏英国歌曲表示感谢”。^{⑤⑩}金登干甚至把展区内中国茶馆的生意兴隆也归功于这些乐师，“因为他们一开始演奏，屋里立刻挤满了人”。^{⑤⑪}他甚至想在下一轮的伦敦发明博览会上再次用音乐，“中国展区将还保持原状，只需添几件用来说明音乐和发明的东西就可以了”。^{⑤⑫}

中国乐人在伦敦博览会上的表现虽然颇令金登干满意，他们的“异国风味”带来的极高的“可

④④ 金登干 1882 年 7 月 21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97 页。

④⑤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7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74 页。

④⑥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0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68 页。

④⑦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0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68 页。

④⑧ 金登干 1884 年 7 月 11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78 页。

④⑨ 金登干 1884 年 8 月 1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87 页。

⑤⑩ 金登干 1884 年 7 月 18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80 页。

⑤⑪ 金登干 1884 年 10 月 3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627 页。

⑤⑫ 金登干 1884 年 9 月 26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622 页。

看性”也一时成了吸引观众的一大景观,但他们所演奏的乐曲除了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女王》能让伦敦人“听出点眉目”外,其他曲目并不为当地所有的媒体认可。^{⑤③}以伦敦的《倍尔美街报》(The Pall Mall Gazette)为例,该报刊登的几篇文章提到中国音乐和中国乐人的表演时都嘲讽有加。^{⑤④}伦敦当地杂志对中国音乐的冷嘲热讽甚至被传到了国内和世界的其他角落。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就转述过伦敦人对中国演剧的印象。^{⑤⑤}连地球“底端”新西兰的报纸也转载了中国人在伦敦博览会上奏乐的消息。^{⑤⑥}

中国乐师演奏英国乐曲虽然取得了在金登干看来非常好的效果,但却被赫德泼了一头冷水。8月12日他在发给金登干的电报中明确指示“中国乐师仅限演奏中国乐曲。”^{⑤⑦}

关于赫德提出的招待会,金登干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因地制宜:

我看最好是在向公共开放前的头天晚上安排一次对中国展区和收集品的“预展”,向所有知名人士发出请柬……它可以是一次私人学术讨论会,尊夫人在那里可以举行一次“在家会客”活动,在晚间欢迎到会的客人并和他们一起聚会,他们到别处是不能做得这么好的。茶馆供应茶水,餐馆供应点心和饮料,可以搭个台来给中国戏班演出。人们将前来享受这新的感受,各国的天才可听听它的效果。^{⑤⑧}

金登干对伦敦卫生博览会中国馆成功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与中国乐人的和睦关系以及他对阿里嗣对中国乐人大打出手事件的公平处理上。当听到阿里嗣与中国乐工发生冲突后(详见下节),金登干“极为不安、气愤和恼怒……立刻派人将阿理嗣叫来,严厉地训斥了他”。第二天早晨,当听完中国侍者向金登干抱怨阿理嗣对中国人动手之事时,他批评阿理嗣说“你的行动,如在任何情况下公诸于众,将给整个海关丢脸。”他要求阿里嗣“尽量用好话和鼓励来引导中国人练习他们的乐曲”,如发现什么缺点,须向他请示,“决不可为任何原因而碰中国人一下”。他甚至警告他说“如果你第二次再这么做,我们将免你的职”。金登干知道阿里嗣和赫德的私交,但事情发生后,他还是立刻给赫德发去电报,告诉他阿“因虐待中国人,可能需调动”。为了避免造成任何负面影响,金登干“指示聂务满先生暗中见了那个目睹整个过程的警察,了解发生的事,特别是他是否曾把发生过的事向任何人报告过”。^{⑤⑨}最后,金登干决定自己管理乐师。中国乐师们在金登干的管理下不但没有任何麻烦,而且“在每一方面的举止都很规矩”。^{⑥①}正是由于有了金登干的调和和公正处事,中国乐工才得以忘却与阿里嗣的不快,在伦敦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伦敦报纸报导说“他们喜欢英国”。^{⑥②}博览会结束时,有些乐工甚至想留下来继续演出。^{⑥③}为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在10月份离开伦敦前夕送给金登干一份由曾纪泽撰写的感谢辞和一本装着他们相片的纪念册。^{⑥④}

^{⑤③} “Lunch with the Celestials”,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5, 1884, p. 4.

^{⑤④} “Chinese Music at the Exhibition”,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10, 1884, p. 6.

^{⑤⑤}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22, 1884, p. 209.

^{⑤⑥} *Marlborough Express*, November 22, 1884, p. 2.

^{⑤⑦} 赫德1884年8月12日致金登干电,《密档》卷八,第335页。

^{⑤⑧} 金登干1884年4月25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26—527页。

^{⑤⑨} 金登干1884年6月13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65—567页。

^{⑥①} 金登干1884年6月27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574页。

^{⑥②} “Lunch with the Celestials”, *The Pall Mall Gazette*, July 5, 1884, p. 4.

^{⑥③} 金登干1884年9月12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6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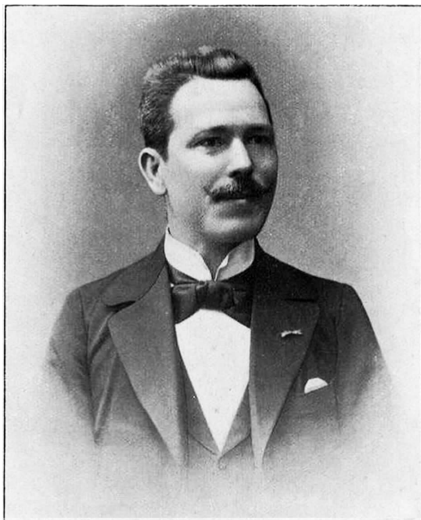
^{⑥④} 金登干1884年10月10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632页。

三 阿里嗣、殴打中国乐人事件、《1884 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中的“中国音乐”词条

与金登干同中国赴会人员的和睦相处形成鲜明的对照，伦敦卫生博览会期间，被赫德专程派赴伦敦讲解中国音乐的比利时籍海关洋员阿理嗣（见图 4）却与中国乐人屡次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并惊动了英国警察。

阿理嗣（J. A. van Aalst）1858 年生于比利时中南部的那慕尔（Namur）城。1881 年 3 月考入中国海关，先是在广州任三等铃字手，后于 1883 年 4 月调内班，在北京总税务司署任邮政供事。由于阿理嗣在音乐上的专长（专业音乐学院毕业，主修长笛，会演奏钢琴和双簧管等乐器），他在 1883 年 4 月 1 日正式就任之前就已经和赫德一起奏乐了。^④ 伦敦博览会他作为比利时人之所以得以成行完全是得益于赫德对他音乐才能的器重。但他却因为性情暴躁专横跋扈最终辜负了赫德对他的期望，不仅没有完成他的本职工作，还差点将赫德“在餐馆演奏音乐，用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乐事来‘折磨’伦敦人的听觉”^⑤ 的计划搞砸。

图 4.



图示来源：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iège Universal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 General of Customs, 1905.

事实上，阿理嗣与中国赴会人员间的不和早在中国赴伦敦的旅途中就已见端倪。中国人起初只是对阿理嗣不满，抱怨他没有尽到他的职责，“在航程中不关心他们的舒适，他们受到的待遇并不像其他二等舱的乘客那样，并且还吃不饱”。在中国团员抵达伦敦不久，阿理嗣就与他们发生了肢体冲突。他借口对方不服从他，“当着警察的面踢了一名乐师和一名厨师”。挨了踢的中国人也不示弱，“抓起一个平底锅就要向阿理嗣冲去，要是警察没拉住他的话，就冲过去了。那些中国人都非常激动。”^⑥ 虽然事后阿理嗣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抱歉”，并“力图与中国人和好”。^⑦ 但他

^④ 韩国鏞 《阿里嗣小传》，第 156 页。关于阿理嗣在海关的履历，参见《密档》卷三，第 193 页。

^⑤ 赫德 1884 年 1 月 14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52 页。

^⑥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13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65—567 页。

^⑦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0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67 页。

旧习难改,事过没有几天,6月23日他就又与中国乐人大打出手。根据阿理嗣自己的陈述,这次是由于“一个中国人粗野地侮辱了他”。但据在场的中国侍者说,那个中国乐师实际上并没有骂他,但的确对阿里嗣“是不恭敬的”,于是阿里嗣就打了他个嘴巴。不过,中国乐师也不是好欺负的,抄起长笛就还手,还把阿理嗣右眼下面打出一个很深的口子。别的乐师也一起揍他,即使是当阿理嗣到中国侍者的房间清洗出血的伤口时,几个中国乐师仍不依不饶地在后面追着抓他。“根据警察的叙述他们会打死他,不过,根据侍者的说法,他们只想把他带到曾侯那里。”事已至此,金登干只好遵循赫德“阿里嗣因虐待中国人应予撤换”的电报指示,正式给阿理嗣写了封信,禁止他“与中国人有任何往来,或在博览会做什么工作”。鉴于中国乐师与阿理嗣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金登干和赫德的弟弟赫政(James H. Hart)都认为不应交给他任何可能与中国人接触的工作。金登干最后决定将阿理嗣从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团秘书一职调离,改派在办公室做不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关系的展品编目工作。^⑧

阿里嗣与中国乐工两次大打出手的事,使金登干和赫德颇为恼火,特别是6月23日那次打人事件,甚至惊动了次日正好来中国展区巡视的曾纪泽。作为中国使节,曾纪泽对洋员阿里嗣不好说什么,只能是对中国乐人多加管教,他“训斥了乐师们,告诉他们受我(指金登干)的指挥,不管我给他们什么指示,他们都得服从。他还告诉他们彼此间一定不能口角等等”。^⑨

以上提到,把阿理嗣派到伦敦卫生博览会管理中国乐师、搞有关中国音乐的讲座,本是赫德的主意。阿里嗣屡次犯错使得赫德很没面子。其实,对阿里嗣的个性及火爆脾气,赫德已有所耳闻。早在阿里嗣赴伦敦之前,赫德就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提醒说:

阿理嗣很有才气,我挺喜欢他,但据说他与他人相处时乖僻而脾气不好。不要把任何一般管理中国人的事交给他。否则他将用他的规章逼得他们发狂。当你通过他向中国人发布命令时,最好是把他们召集起来,让他当着你的面传达并布置工作。他容易发怒,然后用错误的方式来辩解,并且用这样一种方式把他的愤怒老挂在嘴边,以致夸大原来感情上的创伤。^⑩

即使如此,当金登干6月14日电告他“阿里嗣因虐待中国人,可能需调离”的消息后,赫德仍颇感不安。在6月19日的信中,他指示金登干“采取必要的措施”。^⑪第二天,他又在电报中指示金登干“如必要,把阿理嗣的行为报来,避免流言蜚语”。^⑫在6月21日给金登干的信中,他又详细写到:

你那份关于阿理嗣虐待中国人的电报使我不安。我希望他现在举止得当,他有时情绪抑郁、急躁,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他是一个精明人,我对他很感兴趣。像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那样,他当然不具备实际上是遗传下来的那种品德基础:经过三四代人的地位责任感以及高雅生活养成的彬彬有礼,使朦胧意识的人具有“他家族的第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风度和头脑冷静。经验告诉我,尽管这类人确实值得同情和帮助,但把他们扶得太高了是个错误,他们忘其所以,忘却了他们的朋友,为自己拼命获取好处,成为与他们有关事情中的捣乱分子。我给了阿里嗣十分尖锐的书面指示,并警告他你有最广泛的权限。^⑬

⑧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7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73—574 页。

⑨ 金登干 1884 年 6 月 27 日致赫德函,《密档》卷三,第 574 页。

⑩ 赫德 1884 年 3 月 23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498—499 页。

⑪ 赫德 1884 年 6 月 19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79 页。

⑫ 赫德 1884 年 6 月 20 日致金登干电,《密档》卷八,第 330 页。

⑬ 赫德 1884 年 6 月 21 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 570 页。

在6月29日发给金登干的电报中，赫德的确专门致电阿理嗣，告诉他已授予金登干“解雇不能令人满意的雇员”的权力。^{⑦④} 不过，对于阿理嗣由于坏脾气而造成的尴尬，赫德和金登干也都感到遗憾。赫德在6月19日的信中甚至以经济损失心情受影响为由，为他开脱说“这可怜的人失去了他在丽如银行的小笔存款，可能增加了他的忧郁情绪。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人很聪明，但有些急躁，控制不住自己，并且极不愿意任何人‘教训’他。”^{⑦⑤} 在8月26日的信中，赫德又提到“他的急躁竟然使他陷入如此困难的处境，我觉得很遗憾。他的脾气都露在脸上，但他聪明且心地好。”^{⑦⑥} 伦敦卫生博览会结束后，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甚至不无责怪地写到：

你使阿理嗣这么长时间精神上负担过重，我觉得很遗憾。一个星期无疑是罪有应得，但三个月对这青年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十分敏感，并且在受到和蔼体贴对待时，他是够驯顺和充满深情的，至少这是我对他的体会。虽然我经常担心把他捧得太快而使他会像那些已经爬上来的那些人那样，太早就不服驾驭，忘记了帮他们向上爬的梯子。可是我希望你对待他的办法并没有伤害他，而是像“马特洛克的一个疗程”那样有效！^{⑦⑦}

事实上，阿里嗣虐待中国乐人一事并没有影响赫德对他的青睐。伦敦卫生博览会结束后不到一年，赫德就将他提升为四等帮办前班。1896年2月又将其升为北京副税务司兼临时稽查司，并与1897年3月将其调任临时署邮务司。1899年1月阿里嗣被调到邮政局并正式任邮政司一直到1901年1月，然后再调回税务局。在此任内，他被派驻过三山、厦门、梧州等地，直到1914年2月自己辞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里嗣在1884年伦敦卫生博览会上的表现欠佳，但之后赫德仍委派他参加过数次博览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他担任副监督的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The Liège Universal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为此，阿氏还荣获了清政府的三品衔、双龙二等第三宝星及比利时和荷兰的勋章。^{⑦⑧} 阿里嗣虽因此次世博会受到官方的嘉奖，但他与中国赴会人员的关系仍没有根本的改变，如在比利时列日展会期间，他屡与参会的中国人发生矛盾。赴会的两名华商抱怨他“欺凌商人，遇事阻梗”，甚至以罢展相胁。清驻比利时公使杨兆璠（1854—1916）也控告其“傲愎寡俦”，请求将其撤职。清商部接到投诉后也敦请外务部札令税务司“迅电阿里嗣离开会市以顺商情”。最后，阿里嗣以请假为由离开会场。^{⑦⑨} 赫德1905年7月9日在给金登干的信中也提到“中国驻比利时公使已再次抱怨阿里嗣的傲慢，不服从和凶狠”。但他非但没有责备阿里嗣，还替他打抱不平说“由于阿里嗣的工作，中国的展出获得成功，现在他们想过河拆桥了。”^{⑦⑩}

以上提到，赫德派阿里嗣到伦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他在卫生博览会上宣读他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讲稿。但由于种种原因，阿里嗣的讲座迟迟没有做成。在9月7日写给金登干的信中，赫德再

^{⑦④} 赫德1884年6月29日致金登干电，《密档》卷八，第331页。

^{⑦⑤} 赫德1884年6月19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566页。

^{⑦⑥} 赫德1884年8月26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595页。

^{⑦⑦} 赫德1884年12月5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674页。

^{⑦⑧} China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7-1940, Vol. 2, p. 174.

^{⑦⑨} 参见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第77页；刘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6月第25期，第32页。

^{⑦⑩} 见《密档》卷7，第850—851页。

一次提到“我希望阿里嗣将做音乐方面的讲演”。^⑩ 9月28日,他又在给金登干的电报中提到请“阿里嗣做论音乐的报告”一事。^⑪ 但遗憾的是,尽管金登干做了努力,因为“音乐主要属于明年的博览会而不在卫生博览会的方案中”,这个讲座最终还是没有搞成。只是“在中文目录中有阿里嗣写的论中国音乐的短文”。^⑫

阿里嗣虽然在伦敦博览会期间没有完成赫德交给他的讲解中国音乐的任务,但就展示中国音乐来讲,他也不虚此行。因为他“在编目工作上干得不错”^⑬,这里所说的“编目”就包括中国音乐。中外学界谈起阿里嗣时,一般只提到他1884年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上海出版的《中国音乐》一书。^⑭ 正如韩国铎先生所述,阿里嗣之所以成为“1950年代前几乎是有关中国音乐主题被引用最多的一位著者”,就是因为他写了这本在西语读者中流传极广的西文中国乐书。^⑮ 但对于阿里嗣撰写的《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的“中国音乐”词条,却很少有学者提到。^⑯

《目录》中的这篇长达近四十页的“中国音乐”词条是全书的最后一章(第26章),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乐器”(见图5、图6、图7)、“中国音乐简述”、“中国音乐曲目”。与以往博览会上只是将中国乐器与其他中国日常生活用具当成“炫奇”物件在展柜中展出的做法不同,阿里嗣在“乐器”部分不但按照中国的“八音”分类法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雅乐和俗乐中所常用的三大类乐器,即打击、吹奏、弦类乐器,对每种乐器的形制、产地和功用等也大都有简略的提示。他依次解释的革鼓类敲击乐器包括民间乐队中用的堂鼓、民间戏班里用的梆鼓、文庙等宗教仪式上用的搏附鼓、民间艺人用的八角鼓、歌舞用的鼓和街头小贩用的鞞鼓;木类打击乐器有郊庙礼乐中用来表示音乐起始的柷、敔,民间乐队中用来击节的板子、和尚念经时用的木鱼;石类乐器有帝王礼乐用的特磬;金属类乐器有铙、钟、铎、云铙、钹、钲。竹木类的吹奏类乐器有箫、笛子、龙笛、管子、笙;石类的吹奏乐器有石箫、石笛子、海螺;金属类吹奏乐器有葬仪上用的号筒、喇嘛用的喇叭、刚筒;木制和金属类的吹奏乐器有唢呐、鸽哨。弹拨类弦乐器有琴、瑟、箏、琵琶、双琴、三弦、月琴、扬琴;弓弦乐器有胡琴、二弦等。

在《目录》的“中国音乐简述”(Short Account of Chinese Music)部分,阿里嗣首先用了四页的篇幅简述中国人关于音乐起源的传说(伏羲制乐)、律吕(黄帝制律),秦始皇焚书使古乐失传,唐玄宗与康熙的兴乐之举,中国古代所用的五声和七声音阶,元代蒙古人引进的五声音阶、工尺记谱法,工尺谱在时值、节拍、节奏上的缺陷及该记谱法后来的流变。在之后的“仪式音乐”(Ritual Music)一节中,他介绍了中国的宫廷雅乐,文庙礼乐,皇帝祭祀天地、日月、先祖、先农仪式上用的乐舞,包括“儒教”在内的宗教音乐、赞颂歌曲及其所用乐器。在“通俗音乐”(Popular Music)一节,他以戏曲、说唱、民谣、婚庆丧葬鼓班和街头音乐为例简单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音乐。

⑩ 赫德1884年9月7日致金登干函,《密档》卷三,第607页。

⑪ 赫德1884年9月28日致金登干电,《密档》卷八,第346页。

⑫ 金登干1884年10月3日致赫德函,《密档》,第625页。

⑬ 金登干1884年9月12日致赫德函,《密档》,第609页。

⑭ 林青华《清末比利时人阿里嗣与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76—79页。

⑮ 阿里嗣《中国音乐》在20世纪就至少被再版过6次,分别为1933、1939、1955、1964、1965、2012。Han Kuo-huang, “J. A. Van Aalst and His Chinese Music”, *Asian Music*, 11.2 (1988): 127.

⑯ 严晓星在《高罗佩以前古琴西徂史料概述》一文(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8年第1期,第29页)将《1884年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中国展品图示目录》中的“中国音乐”词条与阿里嗣同年出版的单行本《中国音乐》混为一谈,有误。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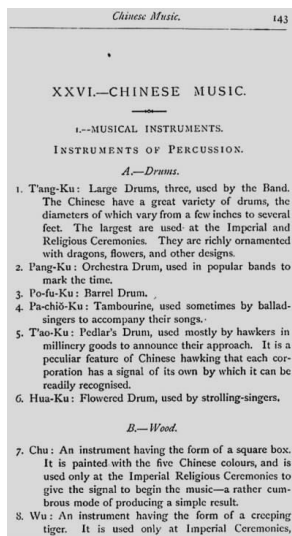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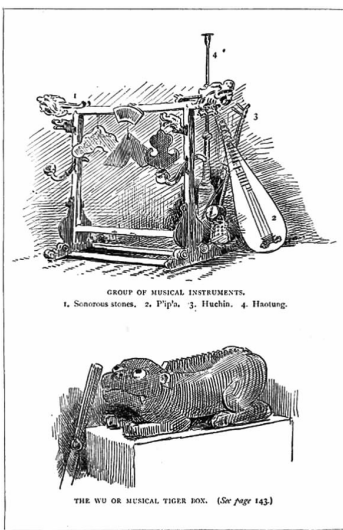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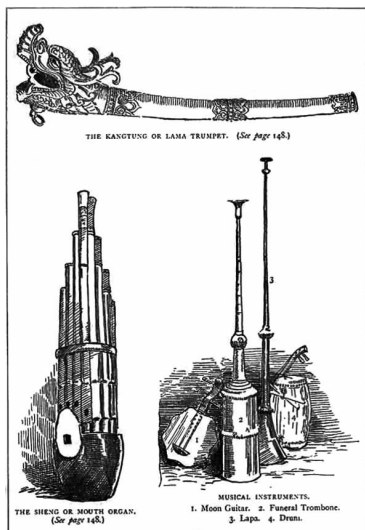


图 7.



图示来源: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 London: William Clowes, 1884.

《目录》“中国音乐”词条的第三部分题为“中国音乐曲目”(Programme of Chinese Music)，“节目单”(Programme)一词表明，此部分应是中国乐人在此次伦敦卫生博览会上表演的节目说明书。这部分由三节组成，分别列举“器乐曲”(Instrumental Pieces)、“声乐曲”(Vocal Pieces)和“戏曲”(Operatic Pieces)唱段。其中前十首器乐曲和前六首声乐曲附有五线谱谱例。十首器乐曲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首被标明为“中国国歌”(Chinese National Anthem)的创作歌曲《华祝歌》(Hwa Tchou Ko)。

《华祝歌》是曾纪泽使欧期间创作的两首国歌之一。该曲为曾纪泽 1883 年 10 月 20 日首创，11 月 27 日命名为“华祝歌”，1884 年 1 月 31 日“注宫商节奏”，同年 6 月 23 日交由赴伦敦卫生博览会中国八角鼓乐工学奏。^⑧《目录》中刊印的《华祝歌》只有曾侯的好友、英国诗人傅澧兰(Humphrey William Freeland, 1814—1892)的英译歌词^⑨，没有附中文原词。但幸运的是，傅澧兰自费刊印的九种语言的《华祝歌》(没有歌谱)单行本里有曾侯的中文原词。^⑩ 以下即是《华祝歌》的中文原词和英译(见图表 1)：

除国歌《华祝歌》外，《目录》中“中国音乐”词条的“器乐曲”部分还附有《大八板》《开手吧》《打花鼓》(见图 8)《大鼓》《柳青娘》《姑娘表》《妈妈好明白》《出殡曲》《婚庆曲》。“声乐曲”部分附有谱例比阿里嗣《中国音乐》一书中的还多，有《进兰房》《王大娘》《烟花柳巷》《大新春》《画扇面》(见图 9)《摔镜子》。其余的歌曲和戏曲选曲则只有歌词大意简介。

⑧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零星提到了《华祝歌》的创作历程，见第 669、679、695、729 页。
 ⑨ 傅澧兰与曾纪泽的前任郭高焘也有过不浅的交往，郭 1879 年离开伦敦时，傅氏也曾以诗相赠。见郭廷以编《郭高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1971 年，第 836—837 页。
 ⑩ H. W. Freeland, *Hwa Tchou Ko, Chinese National Air, freely paraphrased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Hertford: Stephen Austin and Sons, 1887)。日本东洋文库存该译本。感谢东京大学新堀歆乃博士为笔者复印此资料。关于傅澧兰与曾纪泽的交往及《华祝歌》的西文译本，见宫宏宇《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曾纪泽〈华祝歌〉、〈普天乐〉考辨》，第 99—101 页。

图表 1.

<p>1. HOA TCHOU KO—CHINESE NATIONAL ANTHEM.</p> 	<p>《华祝歌》 圣天子 奄有神州 声威震五洲 德泽敷于九有 延国祚 天地长久 和祥臻富庶 百谷尽有秋 比五帝 迈夏商周 梯山航海 万国献厥共球</p>	<p><i>Hoa Tchow Ko — Chinese National Anthem</i> Great Son of Heav'n, Thy glories shine Reflected in thy Land divine. Throughout the World's wide regions known, Thy voice is heard, Thy power is shown. Wise Laws, pure justice, blessings rare, Through Thee may all Thy subjects share! May Fortune smiling bless Thy reign With harvests of abundant grain! Be Thine the virtues, to unfold, Which graced the Patriarchs of old; Through Laws and Counsels rising high, O'er Monarchs of an Age gone by! While distant Nations tribute bring Of Peace the pledge and offering!</p>
---	--	--

图 8.

4. TA 'HUA-KU 'RH—THE FLOWERED DRUM.

Lively.




图 9.

15. 'HUA SHAN MIEN—PAINTING FANS.



Tien - tsin chang si - - yang li - u ching, yo -
 - - yi - ko mei nü Po - su - ying, Chwèn hsiüé tan Ching
 hwei hwa-hwa, Ché chia-jén shih-chiu tung, chang fu nan hsiüé yung kung, Yen
 kau chi la - i tao - sze - yüé chung.

图示来源: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84, pp. 161, 169.

如果将《目录》中“中国音乐”词条与阿氏的成书《中国音乐》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两者间的渊源关系。后者除了在著书目的(“尝试指出中西音乐之异同、用最不使人疲倦的语言阐述深奥难解的理论问题、增添迄今出版的未曾见过的细节、提供简短而扼要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论述”⁹¹)、篇幅(从正文和图示近40页增加到84页)、体例(从展品编目到专书,正文中提供了汉字,加了脚注、中西文书目,增添了旋宫转调图、律吕表、乐舞图例等)外,在整体构架上和理论思维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目录》中的“中国音乐”词条虽然没有同年首版的《中国音乐》单行本影响深远,但也被海外汉学家当成研究中国音乐的参考资料。如法国音乐学家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 1874—1944)在其1909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音乐》一书“研究资料”一节

⁹¹ J. A. Van Aalst, *Chinese Music*, Shanghai, Yokohama,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884, “Introduction”.

中,就列有该文。^⑫德国声学家和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在其经典著作《音调的感觉》中分析的中国音乐谱例也来自对伦敦卫生博览会上中国乐人的“四次私下采访”。^⑬

余 论

有学者注意到,“近代博览会的兴起固然主要是源于商品经济与科技传播的需要,但大众娱乐文化又始终与各类博览会形影相随,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⑭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音乐表演在伦敦卫生博览会上的确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中国艺人在国际博览会上进行音乐表演,1884年的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在1851年就有一个“中国家庭”在伦敦万国博览会上有过声乐和器乐表演。^⑮1867年巴黎博览会举办期间,又有“一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新鲜,冠服华丽,登台演剧”。^⑯1894年,法国里昂举办“国际与殖民地博览会”时,有来自越南西贡富商带领的一团华人演员的表演。^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也有中国戏剧表演。^⑱在国际博览会上展示中国传统乐器,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也不是首例。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的奥匈帝国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的展品中有弦子、唢呐、笛、九云锣、双清琴、皮鼓、二弦、竹二胡、竹四胡、木鱼、清磬、帝钟、小镲、七弦琴、月琴、八角琴、琵琶、箏、箫、八音琴等各类乐器。^⑲

但是,中国在1884年伦敦卫生博览会上的表现却是独特且前所鲜见的。首先,在此次国际博览会上表演的中国乐人是由掌管中国海关的洋员赫德选派的,是由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管理的,而不是民间戏班主挑头组织的;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文化,而不是以谋求个人利益为宗旨。但是,由于选派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其所选择展示的音乐的理解也不同。在赫德的眼里,来自北京的八角鼓艺人能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而在曾纪泽看来,“纯汉族”的“十二个音符的古典音乐”,而非“从蒙古和别处传入的”音乐才应是博览会的上选。^⑳其次,与以往的展示性的唱唱小曲、弹弹琵琶和表演些杂耍的武戏不同,1884年伦敦卫生博览会上中国乐人带给西方观众的是中国北方民间曲艺——八角鼓艺术,这为伦敦人领略纯正的中国民间说唱艺术提供了机会。第三,中国艺人在此次博览会上的表演除了中国民间八角鼓曲牌和民间小曲外,还演奏了当代创作曲目《华祝歌》。此外,中国乐人演奏的英国曲目也开了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乐曲的先河。

(责任编辑:王 婷)

^⑫ Louis Laloy, *La Musique Chinoise*, Paris: Henri Laurens, 1909, p. 7.

^⑬ Hermann von Helmholtz, *On the Sensations of Tone as a Physiological Basis for the Theory of Music*,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5, p. 522.

^⑭ 马敏《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第91页。

^⑮ “The Chinese Exhibition”, *Times* (May 2, 1851); “The Chinese Family”,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y 24, 1851).

^⑯ 王韬《漫游随录》,第93页。

^⑰ 罗仕龙《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戏剧舞台上的中国艺人》,《戏剧研究》,2012年7月第10期,第18页。

^⑱ 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之研究》,黄克武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2003年,第443页。

^⑲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3, pp. 36, 260-262, 286, 348, 396, 474.

^⑳ 《密档》卷三,第627页。